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

90

黄遵宪·梁启超

张永芳 著
◎ 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

张永芳 汉族，山西黎城县人，1946年12月生。南开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，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，获文学硕士学位。现为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。

著有《晚清诗界革命论》

《清代近代诗文述略》、《灵棋经透解》、《二十五史类编·养生长寿术》、《细说刘邦》等学术著作，主编有《情诗三百首》、《情歌三百首》等，还撰有《试论“新诗”》、《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》、《黄遵宪与诗界革命》、《梁启超与诗界革命》等百余篇论文。为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、辽宁作家协会会员等。曾发表诗文创作多篇。

目 录

小 引/1

一、肝胆相照的同乡忘年交/2

(一)共同的深切思念/2

(二)共同的政治理想/9

(三)共同的文学主张/16

二、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诗人——黄遵宪/24

(一)黄遵宪的生平与著作/24

(二)黄遵宪诗歌创作的成就/35

三、近代中国最优秀的宣传家——梁启超/52

(一)梁启超的生平与著作/52

(二)梁启超与近代文学革命/67

(三)梁启超的诗文创作/80

小 引

黄遵宪(1848—1905),字公度,广东嘉应州(今梅县市)人,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诗人,也是著名的学者、政治家、外交家。

梁启超(1873—1929),字卓如,号任公,广东新会县人,是近代中国最优秀的宣传家,也是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和文学家。一度还是政坛要人。

在维新变法运动中,黄遵宪与梁启超曾共同奋斗过,他们都是推动历史前进、处于时代潮流前列的风云人物。

两个广东老乡,两个旷世奇才,两个近代名人,两个文坛泰斗,两个伟大的爱国者,两个知心的好朋友,确有许多相通之处,自然也有许多各自的特色。

他们的生平和著作,他们的经历与思想,他们光耀穹宇的历史地位,他们泣血椎心的文学创作,虽经多人评价论定,仍不失为永远的热门课题。

一、肝胆相照的同乡忘年交

1898年改良派发起的变法维新活动，史称“戊戌变法”，虽然被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当权派扼杀了，毕竟在近代中国引起巨大的震动，产生深刻的影响。在这一运动的发起者中，以康有为、梁启超师徒为代表的广东籍人士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；其中，梁启超与另一个广东老乡黄遵宪的忘年之交尤其值得称道，堪与李白、杜甫这一双子星座作比。

照旧历算法，戊戌变法时黄遵宪五十一岁，梁启超仅二十六岁，两人相差整二十五岁，从年龄看确为两辈人。但他们彼此知心，情谊跨过代沟，早已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兼文友。变法失败，黄遵宪被解除职务押解还乡，穷处僻壤，梁启超则被迫流亡日本，侨居海外。虽遥隔沧海，两人的情谊却日益加深。论及二人的交往和成就，实不妨从他们彼此的思念谈起。

（一）共同的深切思念

戊戌政变之后，梁启超流亡海外，家属也避居

澳门,处境似乎更困顿些;但因旋即创办并主持《清议报》,有事务在身,心境应当稍充实些。就寂寥落魄的感受来说,实以黄遵宪为甚。因而,黄遵宪首先作诗,怀念维新派同志。他刚回到家,便作下组诗《感事》(八首),追忆政变的经过和传闻,内云:“可怜时俊才无几,瓜蔓抄来摘更稀。”对友人的受株连颇觉痛心。随后又作有志感诗多首,如《仰天》云:“篋(qiè)藏名士株连籍,壁挂群雄豆剖图。”将维新志士受迫害,与国难日益深重联系起来,抒发了内心的愤懑不平。这其中,当然包含对梁启超的思念在内。《雁》诗更咏及对海外故人的怀想,实际主要是写给梁启超的。诗作深情绵邈,颇可一读:

汝亦惊弦者,来归过我庐。
可能沧海外,代寄故人书?
四面犹张网,孤飞未定居。
匆匆还不暇,他莫问何如。

归乡后的第二年(1899)年底,黄遵宪写下含八十九首七绝诗的大型自传体组诗《己亥杂诗》,其中第八十三首,梁启超曾刊于《饮冰室诗话》中,署题为《己亥岁暮怀梁任甫》,可见它本是怀想梁启超的诗作:

风雨鸡鸣守一庐,两年未得故人书。

鸿离鱼网惊相避，无信凭谁寄与渠？

诗写得极有感情。但仅从诗的末句也可看出，诗作写好之际并无法传递给梁氏，于是才引起诗人的愁烦和“两年未得故人书”的怨叹。事实上，直待1902年《新民丛报》创刊之后，因汕头洋务局代售此刊，黄遵宪才得以与梁启超恢复了直接联系。诗作当是此后寄达日本，方得收入《饮冰室诗话》之中。

黄遵宪与梁启超的文字交，并非始于戊戌之后。1896年4月二人初识不久，黄遵宪即写下《赠梁任父同年》组诗计六首，对梁启超寄予不同寻常的厚望。其中，第四首表示愿与梁启超共同担负起救国的重任：

寸寸山河寸寸金，瓜离分裂力谁任？
杜鹃再拜忧天泪，精卫无穷填海心。

瓜(kuā)离，分离、割裂；精卫，相传为天帝之女，淹死在海里，遂化身为鸟，不停地口衔木石欲将大海填平，此处以其信念之坚贞同救国志士的情怀作比。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局面前，黄遵宪勉慰梁启超与自己共赴国难，显然是认为梁启超确与自己有此共同志向。而第六首诗，更认为梁启超比自己还堪当重任：

青者皇穹黑劫灰，上忧天坠下山颓。
三千六百钓鳌客，先看任公出手来。

此诗最后一句巧用《庄子》的典故：“任公子为大钩、巨缁(zī, 黑丝线), 五十犗(jiè, 犍牛)以为饵。”将梁启超的号(任父, 又作任甫)与古代钓鳌的名士相提并论, 对梁氏的不凡身手极力嘉赏。当时黄遵宪已是游历海外多国的达官名人, 梁启超则只是二十余岁的赴试举子, 仅以康有为弟子的身份知名于世。难怪有人惊叹:“六首诗的内容, 尤与二人当时的身份地位不相称。”(蒋英豪《“饮冰室诗话”与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因缘》)而且, 黄遵宪与梁启超并非真正的“同年”, 二人中举时间相差二十三年; 诗题中谦称“同年”, 只是表明诗人自己与梁启超同为举人身份而已。身居长辈而与后辈套交情, 的确“是有意显示亲热”(出处同前)。

尤让人感动的, 是黄遵宪存世的最后一首诗, 也是写给梁启超的, 题为《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》。诗作认为自己年老体病, 恐难实现立宪的理想, 勉慰梁启超继续为立宪而努力:“人言廿世纪, 无复容帝制。举世趋大同, 度势有必至。怀刺久磨灭, 惜哉吾老矣。日去不可追, 河清究难俟。倘见德化成, 愿缓须臾死。”在诗的结尾, 还向梁启超正式提出了自己的“政治遗嘱”:

睡狮果惊起, 牙爪将何为?

将下布宪诏，太阿知在谁？
我惭嘉富洱，子慕玛志尼。
与子平生愿，终难偿所期。
何时睡君侧，同话梦境迷。
即今不识路，梦亦徒相思。

诗作于甲辰(1904)年冬，翌年春二月，黄遵宪即病逝。而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写给梁启超的信中，一方面报告自身已“无治疗之方”的病情，表示“一息尚存，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”；另一方面则对梁启超着力推崇：“公学识之高，事理之明，并世无敌；若论处事，则阅历尚浅，襄助又乏人。公今甫三十有三，欧、美名家由报馆而躋居政府者所时有，公勉之矣！公勉之矣！”其所期望，在于政治，意即认为梁启超一定能成为政坛要员。

不妨补叙一句，黄遵宪归乡后未主动与梁启超联系，~~他正有想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雄心。~~1902年恢复联系后，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深长用意：“吾之不欲明与公等往来者，以为使公等头颅无可评之价，盗贼无可指之名，昭雪表示，或者终在吾手，故终且濡忍以待时。”可见他自视甚高，力求涵养相体，以待执掌权柄，大展身手，实现报国的宏愿，并为友人平反冤狱。他因自己疾病缠身，才格外器重梁启超，期望梁氏在政治上大有作为。

能如此交心的同道知己，古今少有。黄遵宪

对梁启超情有独钟，显非出于偶然，也绝非单厢倾心。在两人未恢复联系前，梁启超对黄遵宪亦深深怀念。于是，在《新民丛报》之“饮冰室诗话”专栏中，急不可待地大量评价黄遵宪的诗作。他那种急切的相思之情，丝毫不逊于黄氏。请看《诗话》中的数则表白：

生平论诗，最倾倒黄公度，恨未能写其全集。顷南洋某报录其旧作一章，乃煌煌二千余言（按：即《锡兰岛卧佛》），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。……有诗如此，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。因亟录之，以饯诗界革命军之青年。

黄公度集中，名篇不少。至其《冷别离》四章，度曾读黄集者，无不手不释卷，陈伯严推为千年绝作，殆虚论矣。余因看其数联，顾迄不能全录，惟恨任季帘不知从何处觅得其副本，以见其真，不知其距跃三百也；亟欲流通之于人间世。吾以是因缘，以是功德，冀生诗界天国。

近于诗话中称其诗，海内外诗人贻书索阅者甚多，然急切无从觅致也。今其官日本参赞时，如重野安绎、森春涛、龟谷行诸君，皆有唱酬，又闻天南某氏曾在新加坡领事署钞存《人境庐诗》一卷，余正征之东瀛、南岛，幸

得数十篇。自今以往，每次诗话中可必有一鳞一爪矣。

由此可见，尚未取得联系，梁启超已在热情地评价黄遵宪的诗作。二人刚恢复联系，梁启超便在《新民丛报》第十二号刊出黄遵宪的《东海公来简（壬寅四月）》。从此不仅“诗话”专栏继续以大量篇幅鼓吹宣扬黄诗，“潮音集”专栏也开始连续刊载黄遵宪的诗作。据统计，“诗话”全文引录黄诗九十首之多，“潮音集”也发表黄诗近四十首，在数量上大大超出了对同时其他诗人作品的引录介绍，可见梁启超对黄诗特别注重。

梁启超对黄遵宪的推崇，更是不遗余力。黄遵宪的《人境庐诗草》当时尚未刊行，黄氏之所以能成为清末最为人们关注的诗人，其作品之所以能得到广泛的传播，与梁启超在宣传上的积极努力密不可分。除前引评价外，不妨再引录数则《诗话》：

近世诗人，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，当推黄公度。

吾重公度诗，谓其意象无一袭昔贤，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。

昔尝推黄公度、夏穗卿（曾佑）、蒋观云（智

由)为近世诗界三杰。

对于黄遵宪的去世,梁启超哀恸欲绝,认为是“天祸中国”,可见对其评价之高。《饮冰室诗话》云:“二月二十八日,忽得噩电,嘉应黄公度先生遵宪既归道山。呜呼痛哉!今日时局,遽失斯人,普天同恨,非特鄙人私痛云尔。……先生治事、文理、密察之才,以吾所见国人多矣,未有一能比也。天祸中国,蹉跎之数十年,抑亦甚矣。乃更于其存亡绝续之顷,遽夺斯人。呜呼!何一酷至此极耶!”梁启超虽未作诗回赠黄遵宪,但在《诗话》中引录了多人多首题赠或哀挽黄氏的诗作,也足以见其真情。与黄遵宪比,梁启超不能算是专业诗人,无诗回报,当属正常。至于怀思之切,二人不遑多让,都将对方当作最贴近的知己。其交谊之深,的确堪称人间佳话。

(二)共同的政治理想

黄遵宪与梁启超的交往,实缘于共同的政治理想。宣统元年(1908),梁启超在《嘉应黄先生墓志铭》中郑重地提及这一点:

某以弱龄,得侍先生,惟道惟义,以诲以教。获罪而后,交亲相弃,亦惟先生咻噢振厉,拳拳恳恳,有同畴昔。先生卒前之一岁,

诒书启超曰：国中知君者无若我，知我者无若君。

“惟道惟义”指的便是救国的志向和方略。

1896年春，黄遵宪参与《时务报》之筹办事务。有人举荐章太炎为主笔，黄遵宪认为章氏之文乃文集之文，不是报章之文，婉言拒绝。根据平素对海内人才的了解，黄遵宪写信召梁启超来上海，一见面便谈得很投机，于是决定聘梁氏为主笔。梁启超自传《三十自述》云：“三月，去京师，至上海，始交公度。七月，《时务报》开，余专任撰述之役，报馆生涯自兹始。”黄遵宪对于梁启超的撰述才华十分欣赏，晚年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回忆说：“既而游历欧洲，历南洋，又四五年，归见当道者之顽固如此，吾民之聋聩如此，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，藉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，而伯严苦劝之作官。既而幸识公，则驰告伯严曰：‘吾所谓以言救世之责，今悉卸其肩于某君矣。’”（《壬寅十一月朔日笺》）其期望之殷、推许之重，显然是认为梁启超的宣传能力在自己之上。前引赠诗称“先看任公出手来”，实在是出自肺腑的衷言。正是找到理想战友的喜悦，使得黄遵宪对祖国的前途萌生信心，于《赠梁任父同年》组诗的第一首中热情洋溢地写道：

列国纵横六七帝，斯文兴废五千年。

黄人捧日撑空起，要放光明照大千。

此后，黄遵宪与梁启超的往来日益密切。相识后的当年(1896)和第二年(1897)，黄遵宪先后将自己所著《日本国志》和《人境庐诗草》的稿本拿给梁启超过目。梁启超在拜读之后都作有《跋语》，对黄氏的经历和思想有深切的理解，而且都偏重于政治上的评定。《日本国志跋》云：“先生之为学，不肯苟焉附古人以自见。上自道术，中及国政，下逮文辞，冥冥乎入于渊微。”《人境庐诗草跋》云：“人境庐主人者，其诗人耶？彼其劬(qú)心营目樵形，以斟酌损益于古今中外之治法，以忧天下。其言用不用，而国之存亡，种之主奴，教之绝续，视此焉，吾未见古之诗人能如是也。其非诗人耶？彼其胎冥冥而息渊渊，而神味沉酣，而音节入微，友视骚、汉而奴畜唐、宋，吾未见古之非诗人能如是也。”这两个跋语，在本著刊刻行世之际，都已附印于后。两人心心相印的知己之感，也藉此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出于对梁启超的赏识和器重，黄遵宪在参与湖南新政期间，奏请开办时务学堂，并与巡抚陈宝箴商议，延聘梁启超为总教习，培养出一大批维新人才，蔡锷、唐才常等即为学员中佼佼者。

戊戌年间，梁启超由上海回京，随其师康有为参与新政，政变后逃往日本。黄遵宪则被朝廷任命为驻日大使，抱病由湖南赴京接任，途经上海时

恰逢政变,被解职放归。待1902年二人重新恢复联系后,因睽别久蓄的感情一发而不可收,常有信函往来。梁启超要主办《新民丛报》和《新小说》,余暇不多,写给黄的通讯文字较少;黄遵宪则推心置腹,畅所欲言,连篇累牍,恣意谈吐。《饮冰室诗话》即回顾道:“先生著述百余万言,其数年来与鄙人通信,则亦十数,壬寅本报中所载师友论学笺,题东海公、法时尚任斋主人、水苍雁红馆主人者,皆先生之文也。”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云:“黄公度在维新运动里也是一位很重要的领袖……戊戌以后的六七年内,他和先生(按:指梁启超)有十万言以上的通信,所以先生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。”

黄遵宪对梁启超最大的两点影响,一在于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批驳,一在于对君主立宪制的认同。

正是在黄遵宪等人的影响下,梁启超早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,便对康有为的保护孔教思想产生了怀疑,后来在《新民丛报》发表《保教非所以尊孔论》,主张教不必保,也不可保,“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,惟保国而已”。黄遵宪对此大为赏识,来信称赞说:

报中近作,时于孔教有微词。其精要之语,谓上天下泽之言,扶阳抑阴之义,乃为专制帝王假借孔子依托孔子者借口,以行其压制之术。此实协于公理,吾爱之,重之,敬之,

服之。儒教不过九流之一，可议者尚多，公见之所及，昌言排击之，无害也。

为此共同见解，梁启超不惜与其本师康有为相左。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里自述云：“启超自三十以后，已绝口不谈伪经，亦不甚谈改制。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，国中附和不乏。启超不谓然，屡起而驳之。……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，康、梁学派遂分。”

对于实行立宪的主张，黄遵宪更是喋喋不休，反复申说，在信中多次同梁启超谈及这点：

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，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？胸中蓄此十数年，而未对一人言。惟丁酉（1897）之六月初六日，对矢野公使言之，矢野力加禁诫。尔后益缄口结舌，虽朝夕从公游，犹以此大事，未尝一露。想公亦未知其谋也。

近年以来，民权自由之说，遍海内外，其势长驱直进，不可遏止，而或唱革命，或称类族，或主分治，亦囂囂然盈于耳矣。而仆仍欲奉王权以开民智，分官权以保民生，及其成功，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。仆终守此说不变，未知公之意以为然否？已不能插翼奋飞，趋待左右，一往复上下其议论，甚愿公考究而指

正之也。

公之所唱民权自由之说，皆是也。公言中国政体，征之前此之历史，考之今日之程度，必以英吉利为师，是我辈所见略同也。风会所趋，时势所激，其鼓荡推移之力，再历十数年、百余年，或且胥天下而变民主，或且合天下而戴一共主，皆未可知，然而中国之进步必先以民族主义，继以立宪政体，可断言也。

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，何其与仆相似也。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、孟德斯鸠之书，辄心醉其说，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。既留美三载，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。自是以往，守渐进主义，以立宪为归宿，至于今未改。

黄遵宪不但坦诚地表白自己的见解，而且每每与梁启超引为同调，确有“同气相应，同声相求”之慨。

尽管有共同的政治主张，并非表明二人事事看法一致。黄遵宪还衷心地自白，他恰因梁启超“往往过信吾言”，有时不敢直陈己见，怕梁氏完全接受，“虑或阻公之锐气，损公之高论也”。这才是真正的知己，才是真正的通达明识。

在政治主张上二人的分歧，主要是黄遵宪对